

# The Condition of Economic Growth in Centralized Society:

## The Inframarginal Analysis on the Regional Industrial Division among the Governmental Power and Enterprises

Ziming Li<sup>1</sup>, Xin Liu<sup>2</sup>

<sup>1</sup>Economics and Management School of Wuhan University, EMSWHU, Wuhan, China

<sup>2</sup>Economics and Management School of Northwest University, EMSNU, Xi'an, China

Email: <sup>1</sup>lizimingis@126.com, <sup>2</sup>bebeliuxin@yahoo.cn

**Abstract:** The success of Chinese socialist market economy transform and opening up policy end the doubt from the Western liberalism that the centralized society does harm to the economic growth. On the premise that the corruption of local government and rent-seeking still exist in fiscal decentralization and promotion incentive, however, the high-speed economic growth, region-dependent segmentation and industrial isomorphism are co-exist, which is worthy to analyze the behavior of government and enterprises in different areas under certain institution restriction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Inframargine. In both angles of traverse and longitudinal centralization, this paper will analyze the twist of trading efficiency attributed to the market initial monopoly deletion from government to enterprise; and then explore the Pareto-optimized structure of regional industry, which not only do good to explain the conflict above, but also helpful for the Chinese economic growth in the future.

**Keywords:** Inframarginal Analysis; Centralization; Corruption; Regional division

## 集权社会发展市场经济的条件： 政府垄断势力分散化与区域产业经济发展超边际分析

李子明<sup>1</sup>, 刘欣<sup>2</sup>

<sup>1</sup>武汉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 武汉, 中国, 430072

<sup>2</sup>西北大学经济管理学院, 西安, 中国, 710127

Email: <sup>1</sup>lizimingis@126.com, <sup>2</sup>bebeliuxin@yahoo.cn

**摘要:** 中国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改革与对外开放的成功打破了西方自由主义对于集权社会不利于经济增长的质疑。地方政府的腐败和寻租并没有在财政分权与晋升激励下根除的背景下, 经济高速发展、区域割据和产业同构却同时存在, 这引出对政府和区域企业在既定制度框架下的行为的超边际分析思路。从横向集权和纵向集权两方面对政府因持有市场初始垄断权下放于企业对交易效率的扭曲, 考察企业以帕累托最大化原则下的选择所导致的区域产业结构, 这不但有利于解释上述矛盾, 而且对进一步指导中国的经济的可持续增长有借鉴。

**关键词:** 超边际分析; 集权; 腐败; 区域分工

### 1 引言

在西方资本主义国家, 市场经济的有序发展建立在三权分立和社会契约观念之上。从法理学的角度, 孟德斯鸠从绝对的权力导致绝对的腐败的理论前提提出国家权力应该分立, 互相制衡。根据哈耶克的理论, 分权的社会有利于分散信息的传递, 从而有利于市场经济的发展, 而集权下的计划经济是没有效率的。然而并不尽然。基于亚洲传统价值观的东亚各国和基于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念的转型期的中国, 在经济权力和政府权限集中的情况下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这似乎说明市场化及促进市场化的制度下要素的有效配置, 包括生产过程的配置和价值实现的配置结构(即制度安排)的激励可能是经济增长的原因。从制度产生的绩效看, 专业化与分工, 贸易自由化是市场扩大的表现, 政府政策若符合这样的趋势, 则促进经济和社会的增长<sup>[1]</sup>。正如罗纳多(Reynolds, 1986)所说“除

去政治原因,决定一个国家经济增长转折点迟早的因素,是这个国家有效参与由世界经济扩张带来的贸易机会的能力。”<sup>[2]</sup>这对于一国内区际经济发展也是类似的。

新加坡实行高效的廉政建设限制了腐败<sup>[3]</sup>,但是作为小样本国家,政府层级关系简单,不具有代表性。而在财政分权下的中国,地方政府集决策,监督和审核于一体,通过产业政策对本地经济决策和干预程度加强。在存在腐败和寻租动机的集权社会里,如何解释区域贸易壁垒和区域竞争下的产业同构与高速增长共存的现象?中国区域经济增长的结构可持续性使我们不得不重视政府参与经济发展的政策力度和角色。本文基于市场经济体制组织资源是最高效的这一前提下,以一种新观点审视政府的权力配置对经济绩效的影响,从微观层面对政府在产业发展和企业的生产安排的促进或抵制作用进行分析,运用超边际方法分析权力分配与企业微观个体的行为选择,从中找出答案。

## 2 文献综述

政府在市场经济中的作用的考察需从政府的权力特点出发。青木昌彦根据 North(1990), Weingast 等人的研究总结,“政府既有创造并保持竞争市场的权力也有没收公民的财富的权力”<sup>[4]</sup>因此对政府的特殊制度的约束有助于政府采取支持市场的政策选择。松山公纪认为“政府是‘强制执行合同的权利使承诺具有可靠性或更一般地作为经济优惠的潜在分配者,采取将形成有效结果的政策和行动。’”<sup>[5]</sup>即有效配置资源。政治学者戴维·伊斯顿(D. Easton)认为公共政策就是对全社会的价值作权威的分配。<sup>[6]</sup>这里的价值是广义的,暗含基本的政治学假设,即利益及利益关系是人类社会活动的基础,因此,政府的基本职能就是对利益进行社会性权威分配,并从公共政策这一表现形式中体现出来。在进行社会权威性分配的初始阶段,集权社会权威的初始不受限制,因此存在腐败和寻租的风险,即政府官员利用公共权利谋取私人利益,并且该行为导致的社会成本大于私人收益。学术界的主流观点认为腐败抑制资本投资,加深政治和经济的不稳定性,减缓了市场开放和政治改革的步伐而不利于社会经济转轨。<sup>[7]</sup>一些学者认为腐败可能是一种生产性活动而有一定正效应,客观上为经济发展起到润滑剂作用,在法律、制度严重影响工作效率

的情况下,没有必要抵制腐败。经济学界对腐败的研究从 Becker and Stigler (1974)<sup>[8]</sup>开始,大多数(Banfield, 1975<sup>[9]</sup>; Rose Ackerman, 1975<sup>[10]</sup>, 1978<sup>[11]</sup>; Klitgaard, 1988<sup>[12]</sup>)运用委托代理模型对腐败问题进行研究。塞缪尔·亨廷顿(1988)认为政府法令的增多所导致的腐化会有助于刺激经济的发展。腐化也许是克服阻碍经济扩展的那些传统法律和官府规定的一种方法。<sup>[13]</sup>Mauro, P (1995)进行了第一个系统性的针对腐败的经验分析,利用跨国样本数据研究了腐败是怎样影响经济增长的,结论是腐败对投资和经济增长有负面影响。<sup>[14]</sup>

Wei, S. - J. (1997, 1998)证明腐败对外国投资有负面影响,腐败不是降低,而是增加了做生意的成本。<sup>[15][16]</sup>Vito Tanzi and Hamid Davoodo (1997)认为公共投资很容易为试图获取贿赂的官员提供可乘之机,因而腐败增加了公共支出,但往往扭曲了产业投资政策;大量公共支出款项流入私人腰包,大大降低了公共收益,损害了基础设施的生产效率。

<sup>[17]</sup>Jeans Chr. Andvig and Karlove Moene (1990)认为官员在道德方面存在着差异,当从腐败中获得的收益大于道德方面的成本时选择腐败。<sup>[18]</sup>本文并不直接分析腐败的直接效应,而是从暗含腐败的政府主体假设出发,分析企业在既定框架下的选择。

在结合产业组织形态与具体的经济结构中,施莱弗(Shleifer Vishny, 1993)借用产业组织理论中“联合垄断”<sup>[19]</sup>(joint monopolist)构建腐败模型,指出政府体制和政治体制是决定腐败程度的重要原因,脆弱的不能有效控制下级的政府往往表现出很高的腐败水平。政府作为“垄断供应商”给予私人企业互补性的批准或许可,若某强势的腐败政府可有效控制下属机构,它们就会把投资许可需要的腐败控制在较低水平,以免过分影响市场对规划许可的需求,即政府只要实现总贿赂的最大化。反之,如果腐败的政府对下属机构的控制力差,负责投资和规划许可的两个部门会以各自的腐败水平最大化而各行其道,于是贿赂的价格被任意抬高。本文的假设也将建立于该前提下。

另外的新角度是以杨小凯为代表的新兴古典经济流派。通过把斯密的分工思想和科斯的交易费用理论引入经济增长模型,证明了制度变迁即“交易效率”<sup>[20]</sup>(Transaction Efficiency)的演进是经济增长背后重要的驱动力量。分工的结构是由消费—生产者生产系统的超边际分析来选择自给自足和参

与分工的模式，且证明角点均衡是符合一般均衡理论的瓦尔拉制度。这给予本文分析政府组织和产业组织各自的行为选择以新的框架。但杨小凯没有对影响交易效率做内生性的定量分析，在集权社会的政府在以经济主导型的方式下的行为方式，不能脱离经济组织的发展绩效而单独考察政府层级间的博弈关系或成本-收益，而应该结合产业中的微观主体与政府在既定制度框架下的互动关系，以演进的关系来考察。

### 3 无区域间产业分工促进上级政策时企业的区域分工选择

#### 3.1 前提与假设

首先，关于集权的界定

集权分为横向集权与纵向集权，横向集权即在同一级别政府的不同部门之间决策，监督，审核权力的集中和目标一致性，纵向集权指上级对下级政府处理事务，尤其是参与经济事务的绩效要求。在分析无区域间产业分工促进上级政策时企业的区域分工选择时，仅考虑横向集权。在分析有区域间产业分工促进上级政策时企业的区域分工网络时，将加入考虑纵向集权程度。

其次，关于腐败与寻租的界定

仅考虑交易费用为内生，即与交通等外生条件无关。决定交易效率的是市场权力在转移过程中的等价交换，若有缺失则推出存在腐败。因此腐败和寻租空间是伴随权力转移不可避免的，其存在必然导致经济效率与完全竞争市场下的扭曲。腐败的存在导致交易效率的降低，但腐败造成的效率损失需在查处时才能得之，但不能完全查处，故实际的效率损失难以测度。

再次，关于作为产业链条中的企业的假设

(1) 假设处于产业链条中的仅有两个企业 A, B 是均质的，是原材料或上游产品或设备的消费者同时是产品生产者，且分别在两个行政区。两种产品 X, Y 既是消费品又是生产产品，A, B 可选择自给自足或相互交易。即两地区间两个生产互补或生产环节互补型（中间产品之间存在联系，如循环经济或有承接产业梯度转移的）企业进行贸易内分工。

(2) 企业均有对外扩张的冲动，决定是否在区域之间的分工是为了使决策的预期效用最大。

最后，关于地方政府的界定

科斯在《社会成本问题》中曾提出政府的行政协调机制可替代一部分市场机制的观点。政府通过订立新法律、对基础设施投资等弥补市场的不足，作为参与者进行政府采购，作为服务者提供税收与产业政策的优惠，提供交通与市场要素流动的中介服务来扩大市场，促进贸易，培育引资环境和市场主体，为跨行业的或跨企业的有效配置提供服务。其行为特点为：

①政府官员存在个人机会主义，因此地方政府决策中个人机会主义不可避免导致方政府的机会主义及国家机会主义。

②地方政府享有对市场契约的维持权利，即初始市场垄断权利，且必须出让给企业。

③政府的权力垄断体现在产业政策制定中，且相同级别的政府的行为选择和权利空间相同。地方政府下属各个部门对市场准入的权利的下批过程中伴随相同的寻租空间。

④在“晋升博弈”<sup>[21]</sup>中为了短期的 GDP 增长，地方政府在经济决策权与政治权力的耦合时，以持有的市场的初始垄断势力，以经济手段限制跨区域企业的产品准入许可，并限制区域之间的要素流动和企业之间的交易和分工，将造成区域产业同构和重复建设。造成与市场化时区域完全分工时的效率差距，这个差距在数值上等于政府垄断的市场经济租金。

#### 3.2 模型

两个企业的行为选择均为：

$$\text{Max } U = (x_i + kx_i^d)(y_i + ky_i^d) \text{ (效用函数) } (i=1,2) \quad (1)$$

$$\text{s.t. } x_i + x_i^s = 1_{xi}^a \quad (2)$$

$$y_i + y_i^s = 1_{yi}^a \quad (a>1) \text{ (生产函数)} \quad (3)$$

$$x_i^s + P_x y_i^s = x_i^d + P_y y_i^d \text{ (预算约束)} \quad (4)$$

$$1_{xi} + 1_{yi} = L \text{ (禀赋约束)} \quad (5)$$

其中，k: 交易效率系数，

$$k = (1 - q_n^N)(1 - q_m^N) \quad (0 < q < 1) \quad (6)$$

1-k: 交易费用系数

$x_i, y_i$ : i 企业自给的两种产品数量，

$x_i^s, y_i^s$ : i 企业售出小  $x, y$  的数量，

$1_{xi}, 1_{yi}$ : 生产  $x, y$  的时间或资源，

L: 总的可用时间或资源

N 为政府横向层级数，即企业进入另一行政区市场需要经过的审批或特许时由该行政区政府 N 个不同部门共同决定。 $q_n$  为由于垄断权的分化配置给本地区各级政府部门的寻租空间而产生的交易

效率的扭曲,  $q_m$  为产品进入对方行政区时所受对方行政区政府的阻滞, 因寻租产生的交易效率的扭曲。

1、自给自足型 (A 型)

$$x^s=y^s=x^d=y^d=0, x_y, l_x, l_y > 0, \text{ 令 } L=1$$

$$\text{Max: } u=1_{x_i}^a(1-1_{x_i})^A \quad (7)$$

$$\text{由一阶条件: } du/dl_x=0 \quad (8)$$

$$\text{得角点解为: } 1_{x_i}^*=1_{y_i}=0.5, \quad (9)$$

$$x^*=y^*=0.5, u_A=0.5^{2a} \quad (10)$$

2、分工型 (D 型)

第一种组态 (x/y), 表示 i 企业出售 x 商品并购入产品 y, 且  $x, x^s, y^d > 0, l_x=1, x^d=y^s=l_y=0,$

$$\text{Max: } u=xky^d \quad (11)$$

$$\text{s.t. } x+x^s=l_x^a, l_x=1 \quad (12)$$

$$\text{得: } u=(1-x^s)(1-q^N)x^s/p_y \quad (13)$$

由一阶条件:

$$x^s=0.5 \quad (14)$$

$$y^d=0.5p \quad (15)$$

$$u_x=k/4p_y \quad (16)$$

第二种组态 (y/x), 表示 i 企业出售 y 商品并购入产品 x, 且  $y, y^s, x^d > 0, l_y=1, y^d=x^s=l_x=0,$

$$\text{Max: } u=ykx^d \quad (17)$$

$$\text{s.t. } x+x^s=l_x^a, l_x=1 \quad (18)$$

对称的, 由一阶条件:

$$y^s=0.5 \quad (19)$$

$$x^d=0.5p \quad (20)$$

$$u_y=kp_x/4 \quad (21)$$

两企业需要满足效用均等的条件才能使区域分工进行下去, 既

$$u_x(p_x) = u_y(p_y) \quad (22)$$

$$\text{得出相对价格: } P=p_x/p_y=1 \quad (23)$$

但是因为存在地方政府的保护主义, 政府通过征税间接抬高外地产品价格。如图 1 的分工结构下, A 地政府对 B 地 y 商品征税, B 地企业将税收 R 转嫁于产品价格, 则有:

$$p_y^*=p_x+R/y^s \quad (24)$$

$$u_x > u_y \quad (25)$$

与此同时 B 地政府也采取相同的策略, 使得

$$p_x^*=p_y+R/x^s=p_y^* \quad (26)$$

$$\text{即 } P=p_x/p_y=x^s/y^s \quad (27)$$

$$\text{此时 } U_D=Kp/4=kx^s/4y^s \quad (28)$$

(1)  $U_A=U_D$  时, 区域分工与自给自足的效率相同,  $k=(1-q_n^N)(1-q_m^N)=2^{2-2a}x^s/y^s$  (29)

k 的最大值即纳什议价均衡解为两地政府的寻

租空间对交易的扭曲概率相同, 即当  $q_n=q_m=q$  时, 均衡寻租空间导致的扭曲值为:

$$q^*=(1-2^{1-a}\sqrt{x^s/y^s})^{1/N} \quad (30)$$

**推论 1:**  $\partial q/\partial N > 0$ , 说明随着分管部门的增多, 寻租对经济绩效的扭曲越严重

(2)  $U_A > U_D$  时, 均衡为自给自足, 则:

$$k=(1-q_n^N)(1-q_m^N) < 2^{2-2a}x^s/y^s \quad (31)$$

$$\text{此时 } q > (1-2^{1-a}\sqrt{x^s/y^s})^{1/N} \quad (32)$$

说明因为寻租空间对经济绩效的扭曲超出了合理的范围, 两地的企业自给自足的生产模式的经济绩效将高于区域之间的分工。体现为自发的产业的同构化趋向。

(3)  $U_A < U_D$  时, 均衡为分工, 则有

$$k=(1-q_n^N)(1-q_m^N) > 2^{2-2a}x^s/y^s \quad (33)$$

$$\text{此时, } q < (1-2^{1-a}\sqrt{x^s/y^s})^{1/N} \quad (34)$$

说明扭曲在不影响分工的区间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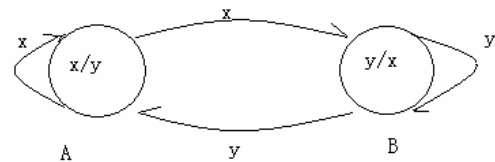


Figure 1. Inframarginal structure of two enterprises in different places

图 1 两地两企业的超边际分析

由以上三种情况可得出:

**结论 1:** 集权社会发展市场经济, 政府初始垄断权下放伴随寻租空间对效率的扭曲, 企业对自给自足或参与区域的行为超边际选择符合帕累托有效原则, 因此经济高速增长与区域之间的产业同构和重复建设的存在并不矛盾, 而是因寻租空间的变动作产业结构的动态取舍。

有关角点解是否符合帕累托有效相关证明见杨小凯的证明, 但是这里仍然受到学术界的质疑。

## 4 有促进产业分工上级政策时产业分工网络

### 4.1 关于政府

#### 4.1.1 假设

(1) 上级政府对下级政府的晋升激励的程度越大, 表明政府的纵向集权度越大。

(2) 产业政策对区域分工有促进作用, 忽略讨论区域分工协作的外部性问题的解决中相同层级政府之间或上下级政府之间对公共品提供的博弈

结果对交易效率的影响。

#### 4.1.2 行为分析

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存在委托—代理关系，中央政府对地方政府官员的任期内 GDP 增长指标评价地方政府官员的政绩和晋升，因此地方政府的目的是以 GDP 衡量的经济绩效。

当上级政策提出跨区域的政策目标时，下级地方政府在贯彻政策，选择产业促进政策时，同样需要考虑企业在自给自足和区域分工时的市场战略，以使产业政策能够发挥实效。由推论 1 可得地方政府对各级部门经济决策权的集中和监督可减少因为寻租和腐败的总量扭曲度。

地方政府官员的预期效用包括晋升的预期效应和腐败的期望收入，设 B 为企业最大的贿赂数（假设  $B < R$ ），C 为晋升的预期收益（即达到更高级职位后的收益，假设  $\partial C / \partial S > 0$ ，S 为政府纵向层级数），p 为晋升的可能性，q 为腐败贪污的可行性，在数值上等于寻租空间内对市场交易效率的扭曲率。地方政府的预期效用为：

$$EU_g = (1-q)p \cdot C + q[p(B+C) + (1-p)B] = pC + Bq \quad (35)$$

上级政策的制度刚性使得区域的分工协作网络有了契约保证，企业因此不会提高、甚至减少对政府的寻租活动。因为在地方政府预期效用不变的情况下，行政集权的社会通过提高晋升的可能性 p 和晋升的预期收益 C，地方政府因为意识到企业的行为，故需要降低所持有的市场初始垄断权下放伴随的寻租空间内对市场交易效率的扭曲，为保证政策的一致性，从而降低了 q 值。在有产业促进的上级政策时，企业和地方政府的博弈结果将推动区域的经济合作。

**推论 2：**上级政府对下级政府的激励力度越大，政府市场垄断权利的下放中政府直接干预经济的力度下降，寻租空间对交易效率的扭曲越小。

当降低的 q 值为  $q^*$  时，在上面的企业超边际决策的模型，若  $q' > q^*$ ，企业的最大化选择应该是自给自足，而这时如果政府没有意识到寻租空间的存在对经济效率的扭曲而强制开展区域之间的分工时，企业存在损失，因此往往不能达到效果。

**推论 3：**当腐败贪污的可行性不足以低至使企业在分工时达到最大化效应，则强制的分工政策效率将低于自给自足的市场选择。

## 4.2 关于企业的产业分工网络

假设两地区有 M 个企业，在政府的产业促进政策下企业作出了参与分工网络的选择，但因为存在对政府可信度或政策力度的质疑，因此其交易的可靠性为 Q，且  $Q = 1 - (1-k)^M$  (36)

$\partial Q / \partial q > 0$  表示晋升的概率与交易的可靠性正相关。k 为每个参与者获得交易的概率，( $k^* < k < 1$ )， $k^*$  为上节所讨论的均衡交易效用系数，且

$$k^* = (1-p^*N)^2 \quad (37)$$

$$\text{Max: } U = xy^d Q \quad (\text{效用函数}) \quad (38)$$

$$\text{s.t. } x + x^s = 1_x^a \quad (a > 1) \quad (\text{生产函数}) \quad (39)$$

$$P_x x^s = P_y y^d \quad (\text{预算约束}) \quad (40)$$

$$1_x + 1_c + 1_s = 1 \quad (\text{时间约束}) \quad (41)$$

其中， $1_c$ ：保持现有贸易的劳动费用，

$$1_c = cM \quad (42)$$

$1_s$ ：拓展贸易的劳动费用，

$$1_s = sk \quad (43)$$

$1_x$ ：用于生产 x 产品的劳动费用

c：平均发展一个商务关系的劳动费用

s：使 r 每增加 1% 所需要的费用

在  $P = P_x / P_y = 1$  时，由一阶条件有：

$$\partial U / \partial x^s = (1 - (1-k)^M) [(1 - cM - sk)^{1/a} - 2x^s] = 0 \quad (44)$$

$$\text{得, } x^{s*} = (1 - cM - sk)^{1/a} / 2 \quad (45)$$

则有：

$$\partial U / \partial k (x^{s*}) = -M(1-r)^{M-1} [(1 - cM - sk)^{1/a} - x^{s*}] x^{s*} > 0 \quad (46)$$

$$\partial U / \partial Q (x^{s*}) > 0 \quad (47)$$

$$\partial U / \partial q (x^{s*}) > 0 \quad (48)$$

$$\partial U / \partial M (x^{s*}) > 0 \quad (49)$$

即分工的网络效用随企业对政府政策的可信度递增而递增，随晋升可能性的增加而增加，而晋升的可能性表现出纵向集权的力度。

$$\text{另有 } M = \ln(1-Q) / \ln(1-k) \quad (50)$$

$$\text{且 } \partial M / \partial q = [-1 / \ln(1-k) \cdot (1-Q)] \cdot \partial Q / \partial q > 0 \quad (51)$$

即晋升可能性越大，参与网络的企业个数越多。由以上分析可得出：

**结论 2：**以晋升激励强度为表现的纵向集权促进了企业参与区域分工网络，进而发挥了分工网络促进经济增长的作用。

## 5 结论与政策建议

中国地方政府在促进经济发展与市场化的过程中起到主导作用。其初始行政垄断转化的市场势力的垄断权转移和下放过程中，不可避免的会存在腐败贪污和寻租倾向，因此跨区域的各个企业需要

调整产品和中间产品的生产和市场策略，来应对地方政府的保护主义策略。中央提出促进产业转移和区域的分工协作政策，地方政府的政策执行力度和政策同样需要考虑企业的市场战略，才能提高中央政策的可实施性。由此可进一步得出结论：

首先，集权社会政府不可避免的存在腐败和寻租的倾向，腐败扭曲的交易效率对产业转移或参与分工影响下，企业将根据最大化原则采取自给自足或参与区域分工的努力。市场化，区域产业同构与经济增长三者并不冲突。在既定的市场权利框架下，企业与政府双向选择的优化产业结构符合经济增长的条件。反之，既定框架下的产业结构选择没有符合帕累托最优的标准将导致效率损失，因此腐败不是阻滞区域经济增长的主要原因。

其次，横向集权的加强体现在横向政府各部门寻租空间的减少，因此减少横向部门的层级，提高市场势力由政府向企业的转移效率，这是促进经济效率提高的关键。

最后，以晋升激励为特征的纵向集权保证了政府产业政策的可信性，减少了寻租空间对交易效率的扭曲对市场发挥网络效应作用明显。但是，晋升激励只是手段，也存在很多弊端。因此应以减少寻租空间对交易效率的扭曲为目的，采取加强或改进行政管理体制建设等多种监督与激励方法，保证集权社会的经济可持续发展。

## References (参考文献)

- [1] Indermit Gill and Homi Kharas An East Asian Renaissance: Ideas for Economic Growth[M]. Beijing: Zhongxi Press, 2008, P2-45.  
(美) 印德米特·霍米·卡拉斯. 东亚复兴: 关于经济增长的观点 [M]. 北京: 中信出版社, 2008, P2-45. (Ch)
- [2] Reynolds, L. Economic Growth in the Third World: 1965 to 1980[M]. 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85, P3-45.
- [3] Wang Zichang, Autocratic Polity and Rapid Economic Growth—Theoretical Analysis and Practical Testing of Lee Kuan Yew Proposition [J]. Southeast Asian Studies, 2003, (2), P34-40. (Ch)  
王子昌. 独裁政体何以会促进经济的快速增长—李光耀命题的理论论证与实践检验[J]. 东南亚研究, 2003, (2), P34-40.
- [4] Masahiko Aoki. Government role in East Asian Economic Growth: Comparative Institutional Analysis[C]. Beijing: Chinese Economy Press, 1998, P18-45.  
(日) 青木昌彦. 政府在东亚经济发展中的作用——比较制度分析[C]. 北京: 中国经济出版社, 1998, P18-45.
- [5] Kiminori Matsuyama. Economic Development as Coordination Problem[J]. Government role in East Asian Economic Growth: Comparative Institutional Analysis[C]. Beijing: Chinese Economy Press, 1998, P149-182.  
(日) 松山公纪. 经济发展: 协调问题[J]. 政府在东亚经济发展中的作用——比较制度分析[C]. 北京: 中国经济出版社, 1998, P149-182.
- [6] David Easton. The Political System: An Inquiry into the State of Political Science[M]. Beijing: SW Press, 1993, P109-120. (Ch).
- (美) 戴维·伊斯顿. 政治体系-政治学状况研究[M]. 北京: 商务印书馆, 1993, P109-120.
- [7] Wu Yiping. Economic Transition, Collective Corruption and Political Reform: Economics Analysis Based on China Experiences[J]. Modern Economic Science, 2005, 27(2), P21-26. (Ch).  
吴一平. 经济转轨、集体腐败与政治改革——基于中国转轨经验的经济学分析[J]. 当代经济科学, 2005, 27(2), P21-26.
- [8] Becker, Gary S., George J. Stigler. Law Enforcement, Malfeasance, and the Compensation of Enforcers[J]. 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 1974, 98 (3), P371 - 400.
- [9] Banfield, Edward. Corruption as a Feature of Government Organization[J]. Journal of Law and Economics, 1975, (17), P587- 605.
- [10] Rose Ackerman, Susan. The Economics of Corruption [J]. Journal of Public Economics, 1975, (4), P187 -203.
- [11] Rose Ackerman, Susan. Corruption: A Study of Political Economy[M]. New York: Academic Press, 1978, P78.
- [12] Klitgaard Robert. Controlling Corruption[M].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88, P90.
- [13] S.P. Huntington, Political Order in Changing Societies[M]. Beijing: Huaxia Press, 1998, P106. (Ch).  
(美) 塞缪尔·亨廷顿. 变革社会中的政治秩序[M]. 北京: 华夏出版社, 1988, P106.
- [14] Mauro, P., Corruption and Growth[J]. 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 1995, 110 (3), P681 - 712.
- [15] Wei, S.- J. How Taxing is Corruption on International Investors? [W]. www. NBER.org. 1997.
- [16] Wei, S.-J. Corruption in Economic Development: Economic Grease, Minor Annoyance or Major Obstacle[M]. Mimeo, Kennedy School, Harvard University, 1998, P6.
- [17] Vito Tanzi and Hamid Davoodo, Corruption, Public Investment, and Growth[M]. IMF Working Paper, Washington D. C, 1997, P97-139.
- [18] Jeans Chr. Andvig and Karl ovemoene. How Corruption May Corrupt[J]. Journal of Economic Behavior and Organization, 1990, (13), P63 - 76.
- [19] Andrei Shleifer and Robert W. Vishny. Corruption[J]. The 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 1993, (3), P599-617.
- [20] Yang Xiaokai, Huang Youguang. Specialization and Economic Organization[M]. Beijing: Jingji Kexue Press, 1999, P30-50. (Ch).  
杨小凯, 黄有光. 专业化与经济组织: 一种新兴古典微观经济学框架[M]. 北京: 经济科学出版社, 1999, P30-50.
- [21] Zhou Lian. Governing China's Local Officials: An Analysis of Promotion Tournament Model[J]. Economic Research Journal, 2007, (1), P36-50. (Ch).  
周黎安. 中国地方官员的晋升锦标赛模式研究[J]. 经济研究, 2007, (1), P36-50.